



澳門理工學院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 澳門理工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Revista do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Edição das Ciências Humanas e Sociais

第十七卷/2014年/第三期

• “全球史”筆談•

主持人語：

二戰後逐漸興起於北美學界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除了是史學界對全球化的主動回應，也有著西方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背景，它是在歐洲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傳統的基礎上，對歐洲中心論和史學研究碎片化趨勢的自我反省。半個多世紀以來，與那些“各領風騷三五年”的史學理論和流派相比，全球史不僅沒有衰落，反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與討論，其影響早已超出歐美學界而成為國際學界的顯學；亦超出宏觀史學領域，其理論與方法被廣泛借鑒到經濟史、社會史、宗教史、藝術史、物質文化史乃至地方史研究中。

東亞（主要是中、日、韓）學界在全球史領域中並未缺席，尤其是近20年來，參與得愈發積極和廣泛，但同時，有關全球史的一些基本問題，爭議也愈發顯現。例如，全球史是否是西方的一種意識形態？如何處理普遍性與多樣性、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問題？如何在全球史脈絡中凸顯民族文化獨立發展的一面，即如何處理全球史與國別史的關係？在全球史的框架下，區域史、文明史是否仍具有必要性，或者應該做哪些調整？人類認同是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未來，抑或僅僅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概覽北美和東亞學者對全球史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同樣的“全球史”，不僅北美學界和東亞學界有著不同的思考角度和關注側重，而且中、日、韓三國學界在對全球史的引介和論述過程中，也有著不同的背景、目的和取向。這一現象十分耐人尋味，它不但體現了“單數的全球史”在“複數的世界”中的困境，而且提醒我們，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學者間進行長期的、密切的交流和對話的必要性。

2011～2013年，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合作舉辦了三次以“全球史／世界史”為核心議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旨在加強三國學者在全球史問題上的相互瞭解和深入交流。我們從2013年12月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中，選取五篇發言稿，編成這組“筆談”，不僅表現《澳門理工學報》對國際學術熱點的關注與跟進，亦希望從一個側面管窺三國學者在全球史研究領域中的不同特徵。

羽田正教授的文章探討了東亞史與全球史的關係、東亞概念起源的政治背景及其內涵變化，尤其強調構建對“地球”的認同感。顧雲深教授回顧了全球史在中國的發展，充分肯定了全球史研究在中國落地生根的學術意義。Federico Marcon教授關注的是全球思想史的可能性，提出思想史書寫的“生態史”闡釋方式，主張將觀念置於社會語境之中。中島隆博教授從歷史哲學的角度探究了“普遍性”和東亞各國的“特殊性”，認為如果能構建出不依賴於條件限制的普遍性，那麼未來的“新世界史”即可得以立足。董少新文章中所涉及的“人類認同”呼應了羽田正教授的“地球”認同，同時文章還論述了“全球史”對其它傳統史學領域的方法論意義。（董少新）

主持人簡介：

董少新，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新竹）歷史研究所博士後，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副院長。研究領域主要有16～19世紀中西關係史、中國基督教史、東亞海域史、澳門史、醫學史、史料學等。專著《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曾獲得省部級以上獎項四項，編著《西文文獻中的中國》，譯著《伯駕與中國的開放》，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已發表各類文章40餘篇，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等多個科研項目。

# 東亞與世界史

[日本] 羽田正（撰）

孟明銘（譯）

雖說標題講的是“東亞”，但還是請允許我從“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開始講起。我在 2005 年出版的《伊斯蘭世界的創造》（中譯本《“伊斯蘭世界”概念的成立》，朱莉麗、劉麗嬌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一書中，論述了當今被廣泛使用的所謂“伊斯蘭世界”這樣一個空間概念是如何成立和展開的。十九世紀的西歐知識分子，已經逐漸具有強烈的“歐洲人”這樣的空間概念上的身份歸屬感，“伊斯蘭世界”一詞，也就是基於這種思維邏輯，被他們創造出來並使用的。在此之前，雖然已經存在著同樣是作為與“歐洲”概念相對應的空間概念，比如說“東方”或者“亞洲”這樣的詞彙，但“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與它們相比，明顯是更加強調了在“宗教與世俗”方面，歐羅巴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區別，這點還是引人注目的。這當中體現出如下一種企圖，即要把“歐洲”樹立成克服了舊時代的宗教因素而完成世俗化的正面榜樣，而“伊斯蘭世界”則依然是被愚昧的宗教所束縛的負面典型。

但另一方面，“伊斯蘭世界”這一概念一旦開始使用後，在穆斯林知識分子當中，也出現了積極利用這一詞語來強調團結統一整個伊斯蘭社會的思想家。具體情況在這裡雖然不能詳細說明，但“歐洲”與“伊斯蘭世界”這兩種世界觀的相互對立，直到 100 年後的當代世界，仍然是存在的。在西方國家中，有人使用這兩個概念來強調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區別，而穆斯林主義者也同樣利用其來號召穆斯林團結起來反對西方文明，對此大家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在這裡想特別促請大家注意的是，在近代歷史學誕生和發展的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上半葉，“歐洲”和“伊斯蘭世界”這樣的概念被“發明”後，一直按照既定的軌跡發展，出現了對“歐洲”、其次是對“伊斯蘭世界”的歷史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者，他們對於這兩個世界過往的歷史，分別進行了解釋和說明。其效果不僅僅在於瞭解歷史，更重要的是，這兩種“空間概念”（也可以稱為“地域概念”），逐漸地實體化了。也就是說，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它們已經成為現實中本就存在的事物。歷史學家怎麼可能會去研究不存在的事物呢？

正如此，當我們採用歷史敘述，對某個空間或者地域的過去進行通史性質的描繪時，實際上就在為這種空間和地域的實體化，或者說現實化作出貢獻，這在先前的歷史當中是沒有過的。這裡我要著重指出的是，儘管前文中指出：某個空間被“發現”之後，其歷史才會被研究和敘述。但這類行為背後，應當有著某種時代訴求或者（廣義上的）政治必要性。

因為與上文的論點相關，在這裡我還想確認一下“通史”的作用。就通史而言，有著將其描述對象實體化、現實化的效用。如果某位歷史學家想要撰寫某個國度或地域的通史，就等於是在

# 全球史研究在中國：傳承與創新

——以復旦歷史系世界史學科發展為例

顧雲深

近些年來，以全球史為旗幟的歷史研究新趨向在歐美學界蔚然興起，一批運用全球史觀念、視野和方法的研究性著作和論文在學術界和公共領域引起較大反響。總體來看，全球史及其蘊含的寫作觀念，強調把整個世界視為一個密切相連、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試圖超越以往從歐洲中心論、民族國家、文明形態等原有研究層次，強調歷史人物、事件、觀念等在全球視野中一系列相交織與傳播的過程，更為關注文明互動、宗教傳播、貿易往來、環境變遷以及疾病流傳等維度，從而呈現出別樣的歷史意義。毋庸置疑，這種歷史寫作觀念的轉變與肇始於 20 世紀 60、70 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態勢息息相關，並與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進一步加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多極化、跨文化交流頻繁化、媒介傳播大眾化、國際學術交流日常化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中國史學界，對全球史研究及相關論著的翻譯介紹也是最近幾年興起的話題，中文“全球史觀”一詞，首先出現在 1987 年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ain Trends in History*）的中文版（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中，譯者楊豫教授將 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 一詞譯為“全球歷史觀”，1988 年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被譯成中文（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全球史”作為一個名詞才為國人所熟知，斯氏的這部《全球通史》的中文本一版再版，印數超過 10 萬冊，北京大學出版社還出版了英文的影印本（2004 年），斯氏的這部書成為一個載體，使“全球史”一詞在中國廣為流傳。尤其是當 1995 年第 19 屆、2000 年第 20 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都把“全球史”列為專門討論的議題之後，中國部分學者和學術機構敏銳地捕捉到史學領域的這個新的發展趨勢，開始積極譯介國外論著和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訪問講學，並以全球史研究為宗旨，成立相關學術研究機構，舉行專題學術會議和講習班，瞭解國際史學界關於全球史研究的學術新趨勢，在專門的期刊和報紙上展開了討論（主要在《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雜誌以及一些大學學報上），討論的文章從開始的每年幾篇，到現在每年有數十篇，說明“全球史觀”在中國有一個引進、消化和逐步吸收其學術精髓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如何結合中國史學界的現狀有所創新，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深化的問題。值得提及的有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在 2004 年成立的全球史研究中心，該中心打破以前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學科界限和壁壘，將中國史納入世界史之中進行整體研究，且形成了全球史理論、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文明互動、歷史上的跨文化交流、全球史視野中的區域研究、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等幾個方向，可以說，該中心較早地以學術機構建制化的方式開創了中國全球史研究的新起點，迄今為止該中心已舉辦多次國際學術會議，探討全球史研究的前沿問題，以及與中國相關的全球史理論。該校劉新成教

# 觀念的世界史是否可能？

[美國]麥孔(Federico Marcon)（撰）

鍾孫婷（譯）

觀念的世界史是否可能？它是否可信？如果是，則是就什麼方面而言？如何才可能有希望實現它？本文將分析“世界史”的不同含義，並探討一種通往觀念史的“生態”途徑，以此作為一種將思想史與世界史互相結合的可能的、即使非常困難的方式。

在最近出版的論文集《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中，Samuel Moyn與Andrew Sartori指出，在接受歷史書寫中的全球或跨國轉向方面，思想史領域已經滯後於其他領域。日本的“思想史”領域亦是如此，儘管與英語世界中的思想史相比，它無疑是歷史書寫中一個更受歡迎的專業化領域。

如果世界史領域之受重視，是要回應和反對具支配性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史學，那麼我們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不論英語還是日語學界的思想史都輕視新的全球化方法。他們聲稱思想史向來較其他領域更少地受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的困擾，也更少受民族—國家的限制。在歐洲思想史中，舉例而言，它經常強調書籍、思想和信徒的動向，跨越地中海（在古代意義上的）這個地理空間，或者跨越早期現代想像出來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這個社會空間。在亞洲歷史中，思想史家們一直以來都關注廣闊的地理區域內的概念、儀式、信仰和術語的潮流、運動、交融和調適，這一地域從坎大哈延伸到日本（如佛教的情況），或囊括東亞諸國（如新儒家的情況）。

在此，筆者將略不恰當地將“全球史”和“世界史”作為大致相當的表述來使用。儘管事實上，“全球”和“世界”在歷史上被使用的方式很不一樣，且各自有著相當獨特的內涵。地球可能是唯一的，一個單獨的物質實體包含著多樣共存的“世界”——個人、集體、精神、想像、政治、語言、社會職業、宗教、藝術等的世界。但這個單獨的地球經由確切的社會經濟進程而成為“全球”——即通過“全球”、“互相聯繫”、“無所不包”和“整合”，雖然正如你可以從地圖上看見的那樣，它相互連結、整合的情況和互相排斥、禁抑的情況一樣多——這些全球化的進程不一定兼容多樣共存的世界。但筆者在此對這個重要的哲學與政治問題不予討論，而限制自己只對世界或全球觀念史的“實踐”做出一些評論。

## 史學籌劃

全球化指向的思想史可以通過不同方法得以形成。Moyn和Sartori劃分出三種形式。

第一種，將全球理解為一個“元分析範疇”。它所產生的歷史分析涵蓋從黑格爾哲學或後黑格爾哲學的“普遍歷史”(universal history，歷史上理性的自我實現過程的複雜性)到各種比較

# 近代東亞哲學話語中 被附加了條件的普遍性與世界史

[日本] 中島隆博（撰）

孫文（譯）

提倡“概念史”的瑞哈德·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過去的未來——通向歷史時間的意義論》（1979年）中講到，西塞羅的名言“歷史是人生的導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代表了將“歷史”視為行為之鑑的觀念，而這種歷史認識在18世紀發生了巨大變化，衍生出新的“歷史”觀念。其根源在於像法國革命、美國革命那樣迥異於過去的歷史事件的出現使得聯繫著過去與未來的連續性紐帶的崩潰。這種趨勢的最直接體現即是德語中有關歷史的表達方式的變化：

德語中作為外來語的 *Historie*，其基本意義原指“就發生的事件進行報告或說明”，而另一種較特殊的意義則趨近於“歷史學”。該詞在18世紀的歷史進程中急速地被 *Geschichte* 一詞代替。1750年左右，出現了 *Historie* 向 *Geschichte* 的轉換，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對文本進行統計學的計算加以驗證。然而，*Geschichte* 主要意味著某事件，即“自身參與的事件、來自外部的事件、行為的結果”。這個詞表達的與其說是“說明事件”，更偏重於“參照事件”之意。<sup>①</sup>

近代發生的是個別事件，而德語的 *die Geschichte* 就是表達這種個別事件的複數形式（50/34）。但是，複數形式的 *die Geschichte* 被壓縮成“集合的單數形式”了（51/34）。科塞雷克提及康德的《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的理念》（1784年），同時就此變化作如下說明：

由作為個別事件的歷史（*Singulargeschichten*）的總和構成的普遍史（*Universalhistorie*）演變成“世界史（*Weltgeschichte*）”之時，康德在尋找將散亂的行為的“拼湊”置換成理性的“體系”的手段。顯然，正是集合的單數形的歷史（*Geschichte*）使這種思考成為可能，這與它是世界史，或個人史無關。（53/34-35）

追求“複數的各別事件的總和”，換言之即是擺脫無序狀態的“拼湊”而最終形成富有理性意味的“集合的單數形”之歷史才是康德的目標。而這個超越了“個體史”的“世界史”究竟是怎樣的呢？康德如是說：

我們從希臘開始追尋歷史——希臘以前的其他歷史及同時代的歷史並不消失，至

# 對全球史的幾點思考

董少新

毫無疑問，我們已處於全球化時代，而且全球化的步伐越來越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處理人類歷史同一性與文化多樣性問題，以及人類發展與環境關係問題。政治、經濟和學術等不同領域對全球化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和應對方法。全球化在歷史學界所引起的反響，則主要體現在全球史理論和實踐的出現與迅速發展。儘管具有宏大敍事特徵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書寫有著古老的起源，但全球史是全球化的產物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全球史是身處全球化時代的歷史學家對全球化形成過程的歷史追溯，試圖為解決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提供歷史視角，並嘗試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提供啟示甚至勾畫藍圖。一般認為，全球史是對整個人類歷史的宏觀敍述。但全球史不是人類所有歷史的綜合和總和，其研究的對象是超越國家、民族、文化、地域和政治形態的歷史進程，主要關注的內容包括跨文化貿易（cross-cultural trade）、宗教和各種思想觀念的傳播、技術的傳播、大規模移民、帝國擴張、物種遷移、傳染性疾病擴散、氣候變遷及其對人類社會的長期影響等。

目前，全球史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已成為國際學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無論是關於全球史理論、方法的論文和著作，還是全球史研究機構、學者、學術會議和課程，都不斷湧現。全球史的興起會對歷史學中的其他學科分支，尤其是對傳統的貿易史、傳教史、文化交流史、國別史、區域史等產生影響，因此，從事這些領域研究的學者，也應主動關注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

## 一、美國的全球史和中國的全球史

歷史學的每一次發展都可以從學術史脈絡和現實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語境中尋找原因。20世紀下半葉興起於美國的全球史（也被稱為新世界史 [new world history]）研究，也是如此。

20世紀兩次世界規模的人類戰爭，不僅使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空前緊密，而且也使國際性協商在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時（如戰爭危機）的作用顯得格外重要。聯合國成立的目的便是希望為國際社會處理共同面對的重大問題提供一種溝通機制。冷戰期間，作為世界一極的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需要具有全球性的視野，並且急需深入瞭解非西方世界。在這種需求下，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和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這兩位希臘史出身的學者轉向全球史研究，並取得開創性的成果和影響力，並非偶然。

從學術史發展脈絡角度來看，全球史在美國的興起是西方世界史、普世史的延續和發展。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什麼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一書中，通過分流（divergence）、合流（convergence）、傳染（contagion）和體系（system）四個全球史研究範式，對西方全球史做了學術史梳理和歸納，呈現出全球史的西方傳統與根基。此外，她還強調了